

# 再探买办兴起的原因

易继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博士生,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 买办曾是西方国家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 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条件下, 买办有其得以滋生的土壤。买办的产生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买办; 早期近代化; 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02)03-0054-04

## A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Rising of The Chinese Compradors in Modern Times

YI Ji-cang

(Dept. of History, Humanities Collage, Zhejiang Univ.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becoming a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society, The compradors used to play a role of a bridge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Chinese economy invasion, and the same time, the compradors were the forerunners of Chinese bourgeoisie. The rising of the compradors had many reason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ose wa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a historical trend for China to turn its feudalism into capitalism, and so do the compradors.

**Key words:** the compradors; early modernization; the bourgeoisie

鸦片战争不仅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 而且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严峻的挑战, 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 追求早期近代化的迫切愿望。近代意义上的买办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近代买办的产生, 原因很多。笔者认为, 近代买办的发生并逐渐壮大有其更深刻的社会背景, 有其滋生的土壤, 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这一目的出发, 他们也会局部地将中国引向近代化道路, 但他们又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牢牢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 不会让中国真正地走向独立自主的近代化道路。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洋行扩大对中国各方面的经济侵略。例如对中国的轮运业, 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其经济侵略的需要, 纷纷在华设立轮运公司。以上海为例: 从 1862~1885 年设立了如下几家轮运公司<sup>[1] (P390)</sup> (见表 1):

表 1 1862~1885 年上海的外资轮船公司

公司	创办者	国别	创办年份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美	1862
公正轮船公司	加罗花洋行	英	1867
北清轮船公司	淳裕洋行	英	1868
太古轮船公司	太古洋行	英	1872
华海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73
扬子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79
怡和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81

中国所进行的早期近代化是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非自主性的因素。即: 中国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近代化运动, 而是要受制于其它先近代化国家。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近代化所共有的特征, 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显著。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目的, 就是要将中国变为其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收稿日期: 2002-01-16

上述轮运公司的成立略见外资对中国轮运业控制之一斑,但是这些轮运公司的存在与发展如果离开了买办就会寸步难行。首先,外商轮运公司需要利用买办商人筹集资金。例如在上述几家轮运公司的创办中,买办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见

表 2 1862~1875 年上海各轮船公司买办的资本统计 \* [2] (P124)

单位: 两

年份	公司名称	创办者	国别	开创资本		买办资本	
				实数	占%	实数	占%
1862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美	1 000 000		330 000 *	30
1867	公正轮船公司	加罗花洋行	英	170 000		51 000 *	30
1868	北清轮船公司	淳裕洋行	英	194 000		58 000 *	30
1872	太古轮船公司	太古洋行	英	970 000		0	0
1873	华海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325 000		60 775	18.7
1873	招商局	官督	中	612 000 **		476 000	77.8
总	计			3 271 000		975 775	29.8

注: \* 估计资本额。 \*\* 包括政府贷款 136000 两。

表 3 1862~1863 年陈竹坪在轮船方面的投资统计 [2] (P124)

轮船公司	总经理人	年份	开创资本	陈竹坪投资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1862	100 万两	13 万两
火标号 Fire Dart	琼记洋行	1862	10 万两	3 600 两
海洋轮船	琼记洋行	1862	14.5 万两	5 000 两
山东号	琼记洋行	1863	8.2 万两	6.97 万两
江龙号	琼记洋行	1863	175 863 元	7 200 元

其次,洋行需要买办商人为其提供轮运货源。

“当一家洋行或几家洋行力求扩大营业额的时候,简单的运费协议是难以执行的,怡和洋行已成为劲敌,因为这家英国洋行通过买办,与中国商人保持着良好关系,坐享额外的好处。怡和洋行早在 1870 年 2 月间就开始了这项活动。当时就曾在唐景星的买办账房名下增设了‘货运代理处’。唐景星在组织该公司的中国雇员方面,以及在与上海和天津货主保持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3] (P145)

再次,是通过买办拉拢华商。例如,在 1870 年 2 月 8 日 F. B. 詹森致 W. 凯锡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认为,就其目前经营情况而论,北清轮船公司连 6 个月都维持不下去,除非是货运量增加,而在目前,这大不可能。我要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就其股份来说,三分之一在淳裕洋行手里,以抵押给伦敦的一些公司,三分之一在华商手里,而他们又都是受唐景星控制的,余下的,这在轮船的高级职员及这里的局外人士手里”。

以上说明,外资轮运业是离不开中国买办的。其实,在所有外资在华企业中,哪里有洋行,哪里就有的买办身影。外资在华洋行需要买办的存在,需要买办为其经济活动服务,并通过买办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始终控制在他们手中。这是

表 2)。例如在旗昌轮船公司 100 万两资本中,陈竹坪投资为 13 万两,顾丰盛 15 万两。除旗昌轮船外,陈竹坪还投资于琼记轮船。1874 年时,旗昌轮船公司的买办商人投资已达 60 万两。关于买办陈竹坪在轮船方面的投资见表 3:

中国近代买办所产生的首要条件。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自身来讲,由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社会内部又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因素,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以及政治的腐败、官僚的腐化,严重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且使国家财政陷于崩溃的境地,没有独立进行早期近代化的经济实力。虽然洋务运动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琴弦,维新运动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火花,清末新政开始了传统社会体制的松动,但实际上,中国不仅在资金、技术上都需要依赖先进国家,而且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要依靠外资的管理经验。这样,买办就成了洋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例如,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以浙沪富商朱其昂为总办,他既不熟悉对外贸易,又缺乏经管轮运的经验,造成招商局管理不善、用人过滥、浪费严重、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轮船招商局罗致多年从事买办的唐廷枢、徐润入局。唐廷枢入招商局,首先投入了资金,并将委托外商经营的“南洵”、“洞庭”、“水宁”、“满族”等号轮船随带入局。在第一期招股中,唐廷枢至少投资 8 万两,徐润投资前后达 48 万两。 [4] (P328) 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呈现一片勃勃生机,1878~1879 年利润达 869 210 两,到 1883 年轮船招商局的资本达 200

万两。

表4 1840~1894年间买办的收入统计如下:[5(P42)]

单位: 万两

收入项目	金额
买办薪金收入	8 800
商品贸易佣金等收入	16 500
出口商品差额收入	7 500
鸦片贸易收入	9 500
外资工厂买办收入	1 900
经手外债的利息差额收入	500
银行买办收入	600
轮运、保险业务收入	1 000
总计	49 000

政府倡办的近代化企业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华人自办的民族工业了。他们不仅要依赖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遭受封建主义的层层盘剥,在夹缝中求生存。华商要想发展,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充当外国洋行的买办,这不仅取得丰厚的报酬和佣金,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还可学到外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可以这样说,买办是最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买办的产生是被逼出来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政府双重压迫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简单的将买办说成是外国资本主义豢养的走狗是值得考虑的。

## 二

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方面使中国的近代化可以借用先近代化国家的工业文明而进行,同时也使我们的近代化呈现出土洋结合、新旧结合的多元结构。这就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复合性。这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因素存在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复合性,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在近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和持久。正是这种复合性,才使中国出现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大规模的近代化工厂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并存、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与落后的封建式的衙门作风并存等等这些怪现象。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复合性,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边际性。一方面,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不得不迈出近代化的艰难步伐以求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在自身传统文明阻碍下,始终难以完成向近代化的过渡,长期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这样一种边际状态。这种边际状态,就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边际人物——买办。因此,与其说买办是外国“侵略者”所培植的,倒不如说是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必然结果。

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活动的急先锋,是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外商在华洋行。他们需要大量华人为其服务,就以优厚的报酬为诱饵,这样就造就了大量的买办,并且使买办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中国最富有的阶层。据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已有买办1万人以上。他们的收入究竟有多少?见表4:

上述收入中还不包括买办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人经营所得。根据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全国财政收入的统计,中国这1万名买办的收入相当于40~60年代中国财政收入平均额10年的总和。在这4.9亿两中,除去买办用于消费的约3亿两,在这54年中买办共积累资金1.97亿两,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如下几项:[5(P42)] 缴纳外资企业的保证金约10 000万两;对外资企业的附股投资约1 200万两;城市房地产的投资约3 000万两;对商业和银钱业的投资约5 000万两;对近代新式工业的投资约500万两。

正是由于买办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依靠洋行在华势力,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而暴富,使他们投资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所可能。到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华纷纷建立企业,买办人数大为增加。据统计,1919年在华外商企业已达8 015家,按每家雇用买办5名计算,买办总数可达4万。有人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平均每家人外企业约雇用买办10人左右,这样,中国买办总数已达10万人左右。

其次是,中国传统的某些方面成为近代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例如洋务派创办的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由于采用封建衙门管理方式,造成管理混乱、贪污成风,收效甚微。洋务派遂委任买办创办、经营、管理这批企业。这又为买办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任开滦矿务局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任热河金矿务局总办;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先后任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总办等等。洋务派决策创办的这些由买办经营管理的大型近代企业,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为买办的大量存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 三

一般来说,落后国家的近代化运动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或威胁下进行的,从一开始都带有“防御”的被动性质,这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自身的传统文明根深蒂固,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在鸦片战争之前,顽固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尊王攘夷、重农抑商的政策,全国上下普遍盲目排外、固步自封。这既阻碍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输入,又遏制了本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昏睡中的古老民族被隆隆炮声惊醒,但对于近代西方文明仍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在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先进人物开始注意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并着手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但广大平民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畏惧与无知却依然照旧,这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但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需要一批比较了解西方文明的人士来传播近代文明。这样,在士大夫中就出现了魏源、王韬、薛福成等,在封建官僚中就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但是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当时还不能为广大平民所了解与接受。在此情况下,需要另一批对西方近代文明有所了解而又比较接近平民的人。伴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来华而生的买办,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这一角色。

早期买办主要是来自封建的官商,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强,不少商人也加入到买办的行列中来,其中有不少平民子弟。即便是官商,在封建体制下也属于社会下层。例如:著名买办唐廷枢就出生寒微;郑观应虽出生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但“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sup>[6]</sup> 历尽“走奔之劳”;买办“五金大王”叶澄衷,家境贫寒;买办朱葆三,幼时家贫,14岁只身来沪学艺;刘鸿生出生于平民家庭,17岁时辍学自谋生路,等等。这些出身穷苦的下层人士,依靠买办职业逐渐飞黄腾达,并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带进买办职业中,为广大下层平民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

其次,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是利用坚船利炮进行野蛮侵略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这就使中国的官民对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一种普遍的对抗心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等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工业文明,带有明显的“防御性”的特色。所以这种近代化运动也始终停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保教”、“保民”、“保种”的基础之上。这种“防御性”的近代化运动很难深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认识到:光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并不能拯救中国,还要学习西方的商业、西

方的政治制度。这就需要将那种“防御性”的近代化变为主动的近代化,需要设法消除国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对抗心理。在这方面,买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大多数买办并未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他们的行为,但客观上他们执行了这种职能。在这一方面郑观应表现得尤为突出。郑观应主张改革政治,实行议会制度;他认为中国要放下中国即“天下”的儒学观点,使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他反对清流党鼓吹的好战的对外政策,主张自强,谨慎对外;他认为工商是西方富强的原动力,因此,中国进行“商战”比进行“兵战”更为重要。郑观应提出的这些观点,代表了以买办为主的近代中国商人的共同观点。

#### 四

以上是中国在进行早期近代运动中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进行近代化的非自主性、复合性、带有“防御性”的被动性。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国买办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最早进入近代化行列的不是完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府,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而是较早地接触了解西方文明的人群:在官僚中以洋务派为代表,在知识分子中以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为代表,在工商业中则以买办商人为代表。近代买办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卵翼下产生的,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买办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定的反动性,但我认为,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为“走狗”。应该说,买办的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具有其历史进步作用。本文只是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买办所产生的原因,求方家指正。

#### 参考文献:

- [1] 聂宝璋. 中国买办阶级的产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2]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 东西间的桥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3] 刘广京. 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 1862—1874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ry in China, 1862—1874) [M]. 哈佛, 1962.
- [4] 潘军祥, 顾柏荣. 买办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5] 郑观应. 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A]. 盛世危言后编, 卷8 [M].

责任编辑 朱健华